

中国女子奥地利留学 被关4个月精神分裂

“原以为能够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是提升自己人生的一次好机会，谁知却遭遇横祸。”30余岁的杨丽说，“为了去奥地利读书，我放弃了国内一切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当初的义无反顾却换来了现在的狼狈不堪。”目前，她正在云南治病，等待着奥地利的国家赔偿通知。2002年，杨丽飞赴维也纳，2004年被投进当地监狱，近4个月后获“取保候审”，2006年7月被法庭宣告无罪，当天即飞回中国。2006年11月，由于精神恍惚身体不适就诊，被云南省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大抓捕

2002年7月4日，满怀梦想和憧憬的杨丽从云南飞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在国内我的专业是英语，由此也就结识了‘奥地利通达(TONDA)国际经济贸易与企业管理与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尚峰和他的前妻谭佩斯，他们主要办理中国人赴奥地利留学中介。”

杨丽最终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奥地利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招收自费留学生的名额，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免学费。杨丽通过通达公司办妥了赴奥地利留学手续。在维也纳经过8个月的学习，杨丽顺利地通过了德语培训考试，于2003年4月正式进入维也纳大学商学院学习“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制为本硕连读。

在维也纳期间，杨丽一直与赵尚峰和谭佩斯保持来往，

也给后者留下了好印象，于是2003年5月杨丽进入通达公司打工，主要负责接送中国新学生。

2004年6月8日上午，正在外面接送学生的杨丽接到一名朋友的来电：“快躲起来，你们公司出事了，警察来抓人了！”朋友是在当地电视台和电台的即时报道中知道消息的。“当时我真的吓坏了，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杨丽说。

原为中国驻奥地利使馆官员的赵尚峰，曾就读于维也纳经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并在政界、商界和外交界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和信誉。已经加入奥地利国籍的赵尚峰还担任奥中文化和教育交流协会常务副主席、奥地利林茨大学客座教授，所有这些情况都是让杨丽放心继续工作的原因。

但是事情突然发生，让她非常害怕警察来抓自己，她的朋友迅速找了一名奥地利律师咨询，当时律师建议杨丽主动去找警察，说清楚情况。等到当天晚上，公司被抓的人仍然没有放出来，杨丽更害怕，于是决定先躲到一名中国朋友家里。

躲藏期间，杨丽又找到一名在维也纳的华人领袖寻求帮助，领袖妻子建议她出来主动去找警察，“因为奥地利警方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中国大使馆，并且特别说明‘杨丽在逃’，当地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杨丽不敢去，她说：“之前我知道一名华人被错误关押了3个月，虽然后来获得了政府的国家赔偿，但是却得了厌食症。后来我又找了第二名奥地利律师，他也建议我先躲着，等警方调查结果出来。

数天后，被抓5人中的3名学生被“取保候审”放了出来，但是赵尚峰和谭佩斯两人

仍然被关押着。由此，杨丽也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警方怀疑“通达公司”在办理中国留学生的过程中使用了假材料，有欺骗和协助中国人偷渡等嫌疑。”

“躲了一个多月后，我觉得这样总不是办法，凡事总得有个了结。”杨丽说，“于是我请了一名律师，由他出面去与法官交涉，当时法官表示最多关14天配合调查，当然最少也必须关14天，于是我决定走出来，心想只要熬过14天就万事大吉了。”

2004年7月28日上午，杨丽在律师的陪同下到了外事警察局，之前她还认真收拾了一小箱衣服，“即使不换洗，14天也足够用了”。孰料她这一去就被连续关押了近4个月，直到11月22日才得以“取保候审”由律师担保出来，“其间的经历不堪回首”。

在狱中

到警察局，杨丽随即被审讯了一整天。她表示自己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接待工作，同时老板也不可能让她这样一名打工的学生知道真实情况。

“但是警察明显不相信我的话，他们轮换了不少人来问我，由于害怕，我就骗他们说我发案时我不在维也纳。”杨丽说，“他们提醒我不要隐瞒情况，不要包庇公司的老板和其他人，否则情况对我不利。”

次日一大早，警察又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关押，直到恢复自由，她就一直被关押在那座监狱里。

其间又有一名奥地利女人被关了进来，她很少与杨丽说话。第12天上午，精神万分疲惫的杨丽突然听到楼下有被关押男女在喊叫，由于声音很大，她突然冲动地拿起餐刀割手腕，“都不知道为什么

会突然那样做”。同房的奥地利人一边抢她的刀，一边按动警铃，于是杨丽被警察迅速带到监狱医务室包扎伤口。

在随后半个多月里，杨丽每天都被带去换药、吃药，虽然后来手腕上的伤口好了，但是医生仍然要求她吃药，并且告诉她吃的是镇静药物。割手腕之后，杨丽进入了一种精神失控状态，每天都不想吃喝，不停地哭泣。其间曾经有中国大使馆官员来看望过她，安慰和鼓励她要坚强，称“大使馆正在积极与奥方交涉”。

每天吃药，让她产生了抗拒心理。2004年9月，医生给了杨丽一种不同的药，然后她就觉得情绪更加烦躁，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多次爬到窗前大声喊叫，吓得同监舍的人不断干涉，两三天后就有警察来提审了。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总编辑王敢说：“杨丽所反映吃了特别药物的情况，很难核实。”

“后来我多次申请参加监狱里的工作，但是监狱方面不答应，说我的情况不适宜参加劳动。”杨丽说，“一直到了10月底，我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监狱方面才答应安排我去工作。”

从案发起，杨丽本人及朋友先后找过5名律师，有律师请求保释，但是法官一直不同意，其间还组织过4次听证，不断重复调查同样的案情。

2004年11月22日，在被关押4个月后，法官终于来宣布杨丽可以办理“取保候审”出狱，但同时扣押了她的护照，并规定其不能离开维也纳，有情况必须向警察报告，并且必须随传随到。

是与非

“通达公司”案两名主要嫌疑人赵尚峰和谭佩斯曾经

是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官员，此次他们都被关押长达14个月，一直到2005年8月5日法院开庭审理后，才宣布允许他们两人假释，但两人所持护照被法院扣压。2006年初，赵尚峰和谭佩斯被法院判处1个月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奥地利《皇冠报》认为：“之前已经将人关押了14个月，这样的判决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了意义。”

杨丽说：“我以前在国内就见过赵尚峰和谭佩斯两次，感觉他们能力很强。后来更发现他们的通达公司办理留学生手续非常顺利，可见奥地利政府很支持这家公司的工作。其被关押期间，奥中两国的许多政界人士都出面帮他说话。”

出事后，杨丽才得知，原来奥地利警方对通达公司及相关人员的监控已经长达两年多时间，包括调查公司人员背景，监控了5000多个通话记录。

在警方的秘密调查过程中，通达公司的少数打工人员听到了一些消息，于是纷纷辞职走人，有些人甚至回了中国。于是在2004年6月8日上午外事警察局紧急出动了80余人，分头抓捕通达公司的6名人员，唯独杨丽“漏网”。

按照奥媒体的报道，警方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把所有中国留学生的资料全部检查了一遍，但是并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只查出了一些小毛病”。

国家赔偿

2006年4月，包括奥新社在内的多家奥地利新闻媒体报道，维也纳刑事法院于当年4月19日正式宣布赵尚峰无罪，从而使通达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得到平反昭雪。

2006年7月14日上午，奥地利维也纳州刑事法院就“受通达公司案所受牵连的4名华裔学生”进行审理和宣判：奥地利籍学生赵瑞、江宇和中国籍学生邱轶、杨丽，4人曾在通达公司从事临时工作或为公司协理到奥地利学习的学生事务，通达公司案发后受牵连，警方以“非法偷渡罪”“组织犯罪团伙”“诈骗罪”和“伪造文件罪”4项罪名指控通达公司并将4人拘禁。这4名学生据理力争，用事实洗刷其清白之身，最后，法庭裁定4名学生无罪开释”。由此，在奥地利闻名多时，使许多华人心有余悸的通达公司案亦已告一段落。杨丽说：“7月14日上午从法庭下来，下午我就从维也纳飞回北京。”

她说：“那时候无法上学，无法工作，最后两个月实在没有办法是在一个教会免费提供的房间住的，一名会说中文的好心神父收留了我。”其间杨丽去检查过身体，也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诊断认为她患了“短期的精神障碍”。

回国后，杨丽不愿与人来往，总是恐惧不安，总怀疑被人跟踪，有人要害自己……2006年11月29日，她被家人送到云南省精神病院诊治，被该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遂住院治疗一个多月，随后一直服药休养。杨丽说：“由于我不能中断治疗，也就无法亲自回奥地利去办理有关国家赔偿等手续，目前我的事情与赵尚峰和谭佩斯的一起由同样的律师在办理。”

2007年10月中，杨丽再次电话联系了北京外交部保护华人处，询问自己的情况，对方表示一直在积极关注此事件的进展，并与驻奥地利大使馆保持着联系。据《南风窗》

英女子丛林坠机险被饥饿同伴吃下肚

现年40岁的罗丝贝尔·科伦吉是英国萨里郡奇蒙市的一名普通女子，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外表普通的罗丝贝尔曾在一场九死一生的坠机灾难中大难不死，奇迹生还。当时，罗丝贝尔乘坐的飞机坠毁在了刚果(金)的偏远丛林中，尽管罗丝贝尔和另外9名同伴从坠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但他们却没有逃过饥饿和疾病的侵袭。一名男同伴在饥饿驱使下，竟试图将罗丝贝尔当成“食物”，将她活吃下肚。幸运的是，罗丝贝尔击退了这名“食人同伴”，并在10天中步行100英里，成了惟一一名走出丛林的生还者。日前，罗丝贝尔首次向英国媒体披露了她惊心动魄的坠机生还经历。

飞机撞树

坠毁刚果(金)原始丛林

现年40岁的罗丝贝尔·科伦吉是英国萨里郡奇蒙市的一名IT业工作者，她有一名女儿。尽管罗丝贝尔三天两头跑步、游泳、打网球，但她却是一名截肢患者，靠一双假肢生活。鲜为人知的是，罗丝贝尔失去的双腿和一场惊心动魄的坠机灾难有关，而她也是那场坠机灾难中惟一一名“最后的生还者”。

1998年9月25日，罗丝贝尔在公司安排下到非洲进行商务旅行，在即将返回英国前，罗丝贝尔和另外8名乘客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登上一架小型飞机，准备在飞行员的带领下到刚果(金)游览3小时。然而飞机起飞后45分钟，罗丝贝尔就听到飞行员狂乱地和地面塔台通话，称飞机失去了控制。罗丝贝尔朝窗外一看，发现飞机飞得相当低，几秒钟后，她就听到一声雷鸣般的巨响，飞机撞上了一棵参天大树，一只机翼被树梢整个撕了下来。乘客们发出恐怖的尖叫，转眼间，飞机就俯冲着坠毁到了地面上。

们的小组失去了两名同伴，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在深夜漫无目的地穿过丛林，此后我们再没有看到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小组剩下的3人继续绝望地前进，希望能发现文明社会的痕迹。除了沼泽中的脏水外，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喝，但我却拒绝喝这种污水。当我们走了几天几夜，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救援者的痕迹后，我们全都感到失去了希望。”

罗丝贝尔回忆称，对女儿的思念让她保持了求生的力量和勇气。罗丝贝尔说：“我渴望活下来，可以再次看到我的女儿和家人，如果没有这些信念，我想我可能早就失去求生意志死掉了。”

饥饿难耐

英女险被同伴吃下肚

几天后，3人中的另一名生还者试图游过一条湍急的溪流时，竟被活活淹死，只剩下罗丝贝尔和一名男同伴继续前行。一周中，由于从来没有吃过一口东西，罗丝贝尔和那名男同伴都已被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他们随时都可能脱倒地，再也无法爬起。

坠机事故发生后第9天，罗丝贝尔的男同伴在极度饥

饿驱使下，竟然试图击倒罗丝贝尔，将她当做“食物”果腹。这名男同伴扑到罗丝贝尔身上，将她死死压在地上，罗丝贝尔差点儿窒息过去。接着，她感到自己的一条手臂发出钻心的剧痛，罗丝贝尔抬头看时，发现那名男同伴正在狂咬她的手臂。

罗丝贝尔回忆说：“他被饥饿逼得发了狂，竟然抓起我的手臂开始咬我，我意识到他想吃了我，我吓得立即和他展开了搏斗，我振起最后一丝力量，不断地用另一只手扇打他，直到他终于放开我。”

10天徒步

惟一一个走出丛林

发生这件“未遂食人事件”后，罗丝贝尔再也不敢和这个男同伴呆在一起，因为她害怕自己晚上睡着时，再次遭到这名“食人同伴”的袭击。罗丝贝尔说：“我开始一个人独自在黑暗的丛林中行走，我感到双腿又胀又痛，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在暴风雪和雷雨天气中不断行走。我忍受着饥饿和寒冷，不愿放弃最后一线生还的希望。”

坠机后第10天，在丛林中不断穿行的罗丝贝尔终于在一处空旷地面上，发现了一群陌生人，她也因此得救。让



罗丝贝尔

罗丝贝尔想不到的是，她在10天中竟然在丛林中步行了160英里远，并且是10名坠机生还者中惟一一个活着走出丛林的“最后幸存者”，救援者告诉她，其他9人全都已经死于饥饿或感染。

罗丝贝尔说：“我太疲惫，太震惊，所以当我得知我是惟一一名走出丛林的坠机生还者时，我甚至无法感到悲哀。当我得知自己在10天中走了100英里远时，我真是惊讶极了。”

被迫截肢

大难不死领悟生命意义

罗丝贝尔被飞机空运回了英国伦敦利斯特医院接受治疗，由于长时间遭遇霜冻，罗丝贝尔的双腿都生了坏疽，必须立即截肢。罗丝贝尔说：“当我在伦敦医院中接受检查时，我的一些脚趾已经脱落下来。医生通过7个小时的手术，齐膝截除了我的双腿。医生告诉我，如果我再晚几小时抵达医院，我可能就不会活下来，因为坏疽病毒将会抵达我的心脏，将我杀死。”

罗丝贝尔在医院中住了10天，然后安上了一对假肢。一个月后，她就开始学会了用假肢走路。罗丝贝尔说：“我丝毫不感到自怜，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在丛林中求生时曾对自己说：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帮助更多的人。当我伤势好转后，我开始重回大学读书，并在伦敦创办了一个为截肢患者服务的慈善机构。今年，我又创立了‘岩石复原’慈善机构，它专门为乌干达的截肢患者提供治疗和心理咨询，以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已经向乌干达寄出了300张轮椅，我希望通过慈善机构再募集到至少100万英镑的善款。”

罗丝贝尔称，那次大难不死的坠机灾难让她领悟了生命的意义。罗丝贝尔说：“许多截肢患者都认为生命的含义已经结束，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坠机事件前，我从来不跑步、游泳和打网球，可现在我三天两头从事这些运动，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比以前更忙碌、更富有意义。我希望其他和我处境相同的人，也能和我一样再次享受生活。”